

70年前的春天,盟军在德国本土长驱直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在欧洲落下帷幕。4月30日,也就是希特勒自杀那天,美军第103步兵师和第10装甲师开进了位于德国最高峰——楚格峰脚下风景如画的小城加米施-帕滕基兴,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城中别墅群作为临时指挥部,以支持美第7集团军翻越阿尔卑斯山与从意大利北上的第5集团军会师。虽未动用一颗子弹,但苛刻的占领军给了当地居民仅仅15分钟时间打包撤离,当一队官兵准备进入佐普利茨街42号这栋看似完美符合要求的别墅时,居住其中的一位耄耋老者提出了抗议,并用英语宣告:“我是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和《莎乐美》的作曲家。”一位成长于“童话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统治的

校门,与我们朝夕相伴,也许,每天都是很平凡的。但有些发生在校门口的故事总会留在我的记忆里,并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

那是在大同中学百年校庆的筹备阶段,我们不分白天晚上,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也没有寒暑假,紧张地工作着。就在一个初秋的晚上,大约七、八点了,我又忙碌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子正准备回家,在校门口,一个大约六十多岁的男子冲着我问到:“盛校长,大同百年校庆是哪一天?”我告诉他:“11月18日。”只听他不由得叹了口气:“唉,我们又不是大同正宗的学生。”我一听便明白,他是那个年代的学生(“文革”期间,大同的学生都是就近对口入学,不是像现在要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因此,他们心里难免会产生自卑)。不禁一阵感慨,于是我对他说:“同学,你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那不是你们的错,是时代造成的。如果没有你们这十年,大同现在还只是九十年而不是一百年,母校欢迎你们回家。”听了我的话,他的脸上立刻露出欣慰的神情,我与他打了招呼便回家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被我的话感动,奔走相告,组织了很多那个年代的学生回母校参加校庆,并加入了庞大的大同校友砖添砖队伍。

故事就是这样延续着,之后我与60年代和70年代的校友都有了沟通和交流,他们要回母校聚会,我为他们安排地方,他们要找当年的老师,我为他们联系落实,有时我还参加他们的聚会,向他们介绍学校这些年的变化和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绩,让他们感受到作为大同人的自豪和归属感。

校庆之后的第二年,一天,来了好几位72届的校友,他们带来了几十本自编的纪念册要送给母校,还邀请我参加纪念册的首发式,我欣然答应。首发式那天,学校大礼堂坐满了校友,气氛热烈而和谐,他们又一次作为大同人回来了!神情和言语中无不表现出对母校以及母校老师的爱戴和感恩。他们是那样地自豪和激动,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我,情深之至。

我仔细地翻看了每一页,153页,26个班级,1523张照片,五大部分,凝聚了40年的同窗情、师生情、大同情,真令人感动。

他们中很多人种过地、打过工、参加过军、上过学,时代历练了他们,造就了他们能吃苦、重情谊、知感恩的品质。

许多时候,在这个大礼堂,我经常可以听见当下大同学子的掌声和欢呼声。但是此时此刻,我却觉得这掌声和欢呼声格外有分量,格外可贵!人是多么渴望得到尊重啊!学会尊重,懂得感恩,这不正是我们的教育要引导学生的吗?

开学后,我把72届校友的故事告诉给在校的学生,让学弟学妹也了解历史,懂得珍惜。

也许,正是校门口的那次偶然的邂逅,引发了更多校友来关注母校,引发了他们心中对于母校的归属感。大同百年校庆的热浪已经过去多时了,但是发生在校门口的这个故事,依然时时萦绕在我心头。它让我思考,一所学校,举办校庆活动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学校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哪里?

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太儿媳和孙辈免遭被送入集中营的厄运,并能继续在山区别墅过着相对平静而富足的生活。

在同施特劳斯的交谈中,理查·施特劳斯常被描

战争中的特别相遇

朱墨青

少校,他立刻命令手下在大师家门口竖起军人禁止入内的标牌,但接下去几天来访的美军反倒络绎不绝。他们的目的不是征用房屋,而是和大师合影,请他签名。虽然免不了有人把他当作《蓝色多瑙河》的作者而闹了笑话,但美军中也不乏内行,其中有一位作为军乐队乐师投身欧战但后来转职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前身)的约翰·德·兰西下士,虽然年仅24岁,但应征前他已是匹兹堡交响乐团的双簧管首席。德·兰西与大师借助法语就音乐与文化进行了漫长的交谈,他熟知施特劳斯众多管弦乐作品中优美的双簧管独奏段落,因此



烟云飞泉 (中国画) 吴国华

说到人潮汹涌,如果具体到这样一组数字,就十分形象了:时至今日,上海地铁的日均客流量为900万人次以上,最高峰时客流量则突破1000万人次;而有上海地铁“第一站”之称的人民广场站,日均客流量达70多万人次,高峰时更超过100万人次,真是人海如潮,汹涌澎湃。

在这样的情形下,地铁站的服务工作可想而知是十分艰巨的,但是,正如熊熊所说,即使压力再大,我们也要让每一位乘客在这里感受到滚滚的暖流。说这话的熊熊是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地铁人民广场站的副站长,全国劳动模范,一个80后女孩,长得白暂而清秀。熊熊刚到人民广场站工作,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太太上洗手间,很长时间没有出来,她的老先生着急了,就去找站务员,熊熊赶到洗手间,发现老太太正手足无措,一脸尴尬,原来,她不慎将大小便拉在了身上了。熊熊连忙宽慰她,帮她擦洗,还拿来自己的工作裤给她换上。老太太感激得一连串地说着谢谢。没想到,一周后,老太太和老先生特地跑来,给她送来了洗净的裤子。让熊熊感动的是,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特意将她的

斗胆发问:“您是否考虑过写一部双簧管协奏曲?”大师摇摇头,终止了这个话题。

6个月后,已回到美国的德·兰西出乎意料地从报纸上得知施特劳斯完成了一首D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原来,他的提议恰是时机——这位在1915年《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之后就停止了纯器乐创作而专攻歌剧的大师当时刚把兴趣转移回器乐上。战争中歌剧院及演出市场的毁灭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年迈的作曲家也表示“虽无创新,但想完善下年轻时的技艺”,从而造就了第二圆号协奏曲、双簧管协奏曲、单簧管与大管双重小协奏曲以及最为人熟知的《最后四首歌》等作品,被誉为大师创作生涯中的“小阳春”。这首双簧管协奏曲由大提琴上的一个摇曳音型开启,随后便是长达57小节速度自由的双簧管独奏,第二乐章同样有连续33小节的抒情独奏,对演奏家的气息控制甚至体力都是巨大考验。但对听众来说,这部作品一扫战争

阴霾,充满阳光气质,通过标志性的摇曳音型贯穿起了三个用传统曲式来建构的乐章,让人仿佛看到一个返老还童的施特劳斯,但又不乏晚年的睿智。

大师没有忘记德·兰西下士,在协奏曲总谱上写下了“应一位美国士兵的建议而作”的字样,并且写信邀请德·兰西参加1946年2月在苏黎世举行的该作首演,还将美国首演委托给他。可惜的是,复员后受聘于费城管弦乐团的德·

工作裤送到一家品牌洗衣店清洗,还熨烫得平整无皱。那一瞬,熊熊感受到人与人彼此尊重的真情实意。

地铁站人潮汹涌,站务员自然便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说自己心情不好,希望站务员能陪其聊天;有的说自己肚子饿了,身上没带钱,让站务员给买个面包;一对外地来旅游的小情侣吵架了,将回程火车票撕个粉碎,然后,哭哭啼啼地

人潮中的暖流

简平

要求站务员帮他们将撕碎的车票拼贴起来。面对这样的乘客,站务员总是尽心尽力给予帮助,为他们送去关心和温暖。其实,上海地铁的站务员大多都很年轻,自己都是需要被关怀的孩子呢。年轻人善良、热情,还充满梦想。熊熊就一直想着,能否让人民广场站流淌更多的暖意和温馨呢?她想,如果让音乐飘进地铁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美好事情,她相信,乘客们都能在柔和曼妙的音乐中放松一些急躁的心情。2013年初,熊熊的梦想得以实现,“上海地铁音乐角”应运而生,两年来,已经

我与上海电视节的情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80年代。我清楚地记得,在电视节首次推出的节目交易市场上,一开始就具备了国际性的色彩,海外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前来参展,他们带来了琳琅满目的影视片,犹如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不仅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也看到了中国影视片与海外的巨大差距。

当时,中国的影视片虽然也踊跃参展,但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低,更是很难“走出去”。在电视节的交易市场上几乎成了海外片、引进剧的一统天下,势力弱小的国产剧只是小小配角。与海外展商的巨大规模相比,当时中国一些影视机构零零散散的展台大多只有“亭子间”这么大,仅9平方米左右,两者差距犹如大航母与小舢板一般,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谁都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已壮大成长为世界上电视剧生产的第一大国,质量也大幅提升。

我记得,当时我引进的40集《鹿鼎记》、史泰龙系列电影等仅几千美元,现在动辄上万,可见内容的价值越来越重要,我买来的动画片《新铁臂阿童木》、琼瑶片《一帘幽梦》等,在20年前还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

可以这么说,当年海外片的大量涌入,既刺激了我们,也使我们大开眼界。真应该感谢上海电视节这一对外开放的窗口。否则,我们只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盲目乐观,中国的影视业永远不会壮大。

从新世纪开始,我创办的“新文化”传媒集团渐渐地把重点从购片引进转向了自己投资制作。这一转折很有意义,

兰西成了个普通演奏员,无权首演作品,遂将首演权转交给了好友——CBS交响乐团的双簧管演奏家米切尔·米勒。他本人在重新做到首席后于1964年才首度演奏了这首属于他的协奏曲,而他演绎该作唯一的录音则是他从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的位子上退休后于1988年录制的。

战争使两位音乐家以如此特别的方式相遇,不能不说是20世纪音乐史上一桩耐人寻味的轶事,同时也催生了作曲家晚年最快乐的篇章,因为在与美军相遇后不久,理查·施特劳斯便因与纳粹合作受审于慕尼黑特别法庭,虽然最后被平反,但直到1949年以85岁高龄辞世,他几乎都在自责中度过。

组织了200余场演出,深受人们的喜爱。每次演出当然又会引来汹涌的人潮,熊熊几乎放弃了全部周末时间,担当义务“运营总监”,维护好秩序。人群中有一个热心观众,但他是个缺胳膊缺腿的残疾人,而且还是个乞丐,有人便会用不屑的口气喝斥他,甚至将他推到一边。但胸襟开阔的熊熊却每次都安排他坐到第一排,还每次都递给他一瓶水。这是一种尊严,是上海这座城市温情暖流的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平的基调。

事实上,当地面人潮汹涌时,在隧道里开车的地铁司机却是孤独的,他们长年累月在黑暗的隧道中与寂寞相伴,甚至看不到阳光。地铁十一号线的乘务组长、上海市劳动模范陆伟,同样是个80后,家住金山,每天清晨四点多钟顶着初起的晨雾出门,坐公交夜班车,用近三个小时时间到达位于嘉定的工作岗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但他无怨无悔,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虽然 he 孤寂地开着列车在漫长而幽暗的隧道中行进,但他将发自内心的阳光般的热能默默输进了滚滚暖流中。

在城市里修路并非易事。

开放的窗口

杨震华

让我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电视剧的崛起,我在上海电视节上的角色也由此渐渐转换。过去,我只是个前来买片引进的配角,从众多海外展台中去设法“觅宝”并寻找商机;但如今,我们中国电视人推出的都是我们自己策划和制作的电视剧和原创节目,而且在整个交易市场上中国电视节目占据了最大份额,配角渐渐成了主角。随着“新文化”制作的数量越来越多,我的展台也渐渐从小舢板变成了大轮船,并成了上海电视节国际影视节目交易会上最为醒目、规模最大的几家之一。如今,20多年过去了,国产剧也渐渐壮大了,并在上海电视节上真正唱起了主角,而当年风靡影视市场的海外片反而成了配角。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中国电视剧的崛起,作为上海业内最大的民营公司,“新文化”制作的电视剧数量去年已跃居全国第一,《领袖》《一代枭雄》《新亮剑》等赢得了口碑和收视,《情系巴塞罗那》等进入欧洲主流媒体播放。

上海电视节开幕前几天,我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准备全力以赴参加接下来的工作。因为,四方宾客都来了,我每天的日程都被排得满满的,甚至连抽空看电影的时间都很难保证。回望20多年前,我只是一个悄悄地埋头在市场上购片引进,那时都是我在找别人。但如今,“我找他”变成了“他找我”,欧美等许多外国同行纷纷踊跃前来找我们“新文化”商谈,进行创意互动,寻找合作机遇,尽管我们整个团队已做了仔细分工,但依然忙得团团转。因为,中国市场、中国故事、中国制作,其影响已经与当年不能同日而语了。



近日有报道称,金陵东路江西路口的沿街骑楼将被拆除,而骑楼恰是金陵东路的风特色风貌,事后方知,只是谎报的“军情”。那么,金陵东路的过街楼是旅沪闽广商人根据南洋或中国南方的建筑形式建造的,是根据什么得出的结论呢?

金陵东路筑于19世纪50年代中,称“法大马路”,因法国领事馆设在该路上,中文名“公馆马路”。当时,筑路的材料主要是泥土、沙石,路的质量很差;交通工具主要是小车、人力车(独轮车、黄包车),对马路的要求不高,大路的宽度只要不低于8-9米,这些规定主要为“免行人之拥挤”,马路不设上街沿。早期的法大马路的东段近外滩,比较繁华,路面略宽,西面冷清,路面稍窄。马路定型后,沿街的建筑也鳞次栉比地建起来了,再要拓展马路就得动迁沿街的房子,麻烦就大了。1908年,法租界开通有轨电车,也只能对法大马路的西段部分过于狭窄之路进行拓宽,使马路的宽度不低于8米。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上海城市人口已近300万,法大马路也已成为繁华的商业街,原始的小车、人力车等交通、代步工具逐渐被电车、汽车替代,狭窄的路面已严重影响和制约法大马路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华。1926年出版的《上海房地产实用大全》中收有法租界关于法大马路建设的规定,谈到法大马路的现状,并规定:此后商家在法大马路两侧翻建、重建房屋,必须退到规定的“红线”外,以确保法大马路的车行道不得小于12米;重建的建筑必须按照规定建成“过街楼”(今建筑界以书面语言称为“骑楼”);过街楼的高度为7米,宽3米;规定过街楼是公共人行道,即上海人所谓的“上街沿”。商家可以在过街楼上建设房子,以此来补偿投资或建设方的损失,也形成了法大马路的特色。

实际上,稍认真调查就会发现,金陵东路两侧的过街楼的建筑全部建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而没有过街楼的建筑,肯定是建于1926年前的老建筑。可见,法大马路的过街楼是规划和法律的结果,不必是旅沪闽广商人根据自己的习惯建造的房子。

十日谈

行在上海